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目的

### 一、研究背景

從宏觀角度來看，冷戰後的中日關係基本上是一個雙方彼此互信不足、卻又必須在某些議題上合作的矛盾不一致現象。中國和日本都有其各自的國家發展目標，對中國來說，隨著綜合國力的提升，不管是在政治、經濟或是在其他各領域，其國際影響力都在不斷的上升當中，並且也試圖擺脫百年來加諸在身上的屈辱及不光榮的一面；對日本來說，由於其二次大戰戰敗的結果，使得他在國際政治的影響力上，一直無法跟他強大的經濟實力互相對應，因此成爲一個「正常國家」（普通の国）的聲音，常不絕於耳，而在冷戰終結之後，這股聲音似乎又更加的明顯。

由於中日兩國之間本來就有著難解的歷史戰爭仇恨問題，再加上彼此鄰近的地緣因素，兩國呈現一股十分微妙且複雜的關係，外交關係起落頻繁，不論是政治或是經濟的議題，均存在著合作與競爭（甚至衝突）的因素，兩國之間形成「既合作又競爭」的交往格局，經濟面的需求和合作較爲明顯，政治上所產生的競爭或衝突則較大，這使得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雙邊關係充滿了「政冷經熱」的詭譎現象。2002年11月28日由岡本行夫等9位所組成的「對外關係特別小組」（対外関係タスクフォース）研究會所發表的「21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報告書中也出現相同的論點，明確將中國列爲21世紀日本外交政策中最重要課題，並指出當前中日兩國是「合作與共存」及「競爭與摩擦」的關係。<sup>1</sup>另外，在合作

---

<sup>1</sup> 対外関係タスクフォース，「21世紀日本外交の基本戦略：新たな時代、新たなビジョン、新たな外交」，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2002年11月28日，〈<http://www.kantei.go.jp/jp/kakugikettei/2002/1128tf.html>〉。

與競爭這兩個面向上，Robert Ross也曾指出，從對抗的角度而言，中國的對日政策在其總體安全政策中佔據著重要的環節，因為日本身為一個經濟大國及潛在軍事大國，將對中國的安全造成影響；然而在合作的層面上，日本龐大的資金及技術對中國經濟發展又有著不可獲缺的重要性存在，而中國的廣大市場也令日本不可能忽視；<sup>2</sup>此外，在地區安全議題上，諸如朝鮮半島、核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管制、促進與維持區域和平及穩定等議題，雙方又具備了合作伙伴的條件。

回顧冷戰時期中日關係，由於受到美國對中國採取「圍堵政策」的影響，不僅使中國在拓展與西方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產生極大的困難，中國與日本的雙邊關係也在國際上共產主義陣營和自由主義陣營的對峙之下，難以發展正式的官方關係，而僅能以民間的經貿往來為核心；而此時的日本也避免碰觸政治這個敏感的問題，但又顧及到經貿的利益，於是對中國採行「政經分離」的政策與中國往來。隨著國際大環境瞬息萬變的影響，冷戰格局出現了些微變化，美國由於Richard Nixon上台，並在1969年發表了一篇標題為「越戰後的亞洲」(Asia After Viet Nam)的文章，相當清楚的顯現了Nixon想要改善與中國關係的意願。<sup>3</sup>他認為任何美國對亞洲的政策，都必須要掌握中國的現實，長遠來看，美國不能將中國永遠排拒在國際社會之外，更不能讓他增長野心，威脅到鄰邦，也不能讓他廣大的人民被孤立於世界之中，因此他表示：這個世界要安全，除非中國有所改變，而美國的目標就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去促使中國進行改變。

美國對中國態度的改變，加上中蘇關係在60年代後出現了爭執，甚至在珍寶島事件上幾乎發生衝突，也讓中國逐漸向美國靠攏，也對美日之間的安全同盟批評減緩，開始有了聯美制蘇的想法。<sup>4</sup>同樣由於美國對中國政策的轉變，日本亦因此改變了其對中國的政策，日本做為美國東亞戰略的一環，雖不像美國採取

---

<sup>2</sup> Robert S. Ross, 「中國90年代的對日政策」, 張蘊嶺主編, **合作還是對抗—冷戰後的中國、美國和日本**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7), 頁195-196。

<sup>3</sup> 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1 (October 1967), p. 121.

<sup>4</sup> 韓念龍主編, **當代中國外交** (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87), 頁241-247。

對中國敵視的立場，但仍將中國視為反體制的國家，但由於美國的改變，使得中日之間改善實質關係成為可能。<sup>5</sup>

1972年7月5日自民黨總裁選舉，田中角榮以壓倒性的票數擊敗福田赳夫，其後也順利在國會首相選舉中當選首相，而田中角榮的獲選也代表著當時日本社會對日中關係正常化的期待。相較福田赳夫與田中角榮的對華政策，其中就有著明顯的不同，福田赳夫在對華的態度上呈現模稜兩可，一方面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提出的「中日復交三原則」<sup>6</sup>，另一方面也和自民黨內親中華民國勢力有密切交往。<sup>7</sup>而田中角榮卻聯合積極主張與中國關係正常化的三木武夫、大正平芳和中曾根康弘等人，形成聯盟，對華態度相當清楚。

第一次田中角榮內閣在1972年7月7日成立之後，以「因應時代的潮流」，立即展開了「日中國交正常化」的對話和交涉。上任後，田中角榮也曾提到：「在動盪的世界局勢下，應該加速實現同中國的邦交正常化，強有力地開展和平外交」。<sup>8</sup>在日本朝野的訪中團陸續訪問中國的情況下，雙方也開始進入關係正常化相關條件的折衝階段；<sup>9</sup>中國方面，包括領導人毛澤東以及周恩來，都曾表示要抓住時機，加緊實現恢復中日邦交正常化。<sup>10</sup>1978年8月中國與日本簽定的「中日友好和平條約」當中加入了反霸的條款，雖然條約強調不針對第三國，但其目標相當明顯的就是蘇聯，<sup>11</sup>反蘇成為當時中國與其他國家發展關係的重要關鍵。

<sup>5</sup> 入江昭，**新・日本の外交—全球化時代の日本の選択**（東京：中央公論社，1991），頁163。

<sup>6</sup> 中日復交三原則：1、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2、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3、日台條約（日華和平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應予廢除。

<sup>7</sup> 趙全勝，**日本政治背後的政治：兼論日本對華政策制定與中日關係**（香港：商務印書館，1996），頁90。

<sup>8</sup> 林武雄，「中國大陸與日本建交30週年政經情勢分析」，**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http://www.japanresearch.org.tw/special-03.asp>〉。關於中日關係正常化可參見韓念龍主編，**當代中國外交**，頁291-299；曲星，**中國外交50年**（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頁327-368。

<sup>9</sup> 緒方貞子著，添谷芳秀譯，**戰後日中、米中關係**（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83-88。

<sup>10</sup> 毛澤東曾指示：「我們現在要爭取聯邦德國和日本，這是兩大任務」；周恩來也曾說過：「長期以來敵視中國的佐藤榮作政府終於被迫提前下台。田中角榮內閣7日成立，在外交方面，聲明要加緊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這是值得歡迎的。」參見曲星，**中國外交50年**，頁345。

<sup>11</sup> 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東亞研究**，第35卷第2期（2004年7月），頁8。

到了 80 年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由於反蘇的關係，大量消耗了國家的資源，無法全力發展經濟，因此在「十二大」提出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強調在國際上不結盟、不對抗以及不針對第三國；而日本也在 1980 年發表了「綜合安全保障戰略」，指出日本要綜合的運用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力量，相互配合、相互補充，以確保日本的和平與安全，謀求生存和發展，也希望日本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能夠不再是仰人鼻息的政治侏儒和被保護國。<sup>12</sup>在冷戰結束之前，日本追隨其大國夢的同時，也造成了中國的不安，中國對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復甦逐漸感到疑慮，特別是被中國視為有鷹派色彩的中曾根康弘在 1982 年底出任首相之後，除承認與西方盟國合作的必要性，也積極提倡強化美日「同盟」，<sup>13</sup>而後又發生了包括光華寮事件、歷史教科書等問題，都使得中國對於日本的軍國主義傾向憂心不已。在此情況下，使得 80 年代的中日關係看似緊張，但中日雙方此時卻藉由「首腦外交」的應用，<sup>14</sup>大致解決了雙方的歧見。像是 1982 年 7 月的歷史教科書事件，使得先前因趙紫陽訪日而促成的熱絡冷卻了下來，但隨後日本首相鈴木善幸的訪中，承諾在 1982 年度提供中國六百五十億日圓的貸款，也使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的來源。<sup>15</sup>日本的這些動作也順利了穩定此時中日關係。類似的「首腦外交」應用，也包括了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時的兩度訪中，在第一次訪中之後，中日關係可說達到了空前的高峰，但後來由於中曾根康弘個人政治立場所引起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使得中日關係轉而不睦，但藉由第二度的訪中，不至讓雙邊關係探入谷底。

---

<sup>12</sup> 樊勇明、談春蘭，**日本的大國夢**（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3），頁 16。

<sup>13</sup> 1979 年 5 月，日本首相大正平芳訪美時，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以同盟一詞稱呼日美關係，但這一用詞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注意。1981 年，鈴木善幸首相訪美時與雷根總統發表聯合聲明，雙方首次共同使用了「美日同盟」字眼，但這在日本國內引起了很大的爭議，直到中曾根康弘首相之後，「美日同盟」才被廣泛使用。參見張蘊嶺，**伙伴還是對手—調整中的中美日俄關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頁 254。轉引自邱坤玄，「中共對冷戰後美日安全關係的認知與新安全觀的形成」，頁 9。

<sup>14</sup> 唐暉，「試論日本的首腦外交」，載於北京大學日本研究中心編，**日本學**，第五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23。轉引自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9），頁 119。

<sup>15</sup> 世界の動き社編，**世界情勢と日本外交**（東京：世界の動き社，1990），頁 18。

日本在「天安門事件」之後，在面對其西方盟國一致試圖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和孤立中國的同時，展現了有所不同的對中政策。即「交往」和「介入」，而不是「孤立」或「封鎖」，這種途徑頗類似於吉田茂當年對「共產中國」的最初構想，認為日本有能力也有資格扮演西方國家與中國之間的橋樑角色。而中國當時的外交部長錢其琛即對日本政府首先對中國恢復貸款表示讚揚，<sup>16</sup>認為這在鬆動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制裁上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蘇聯瓦解，冷戰結束之後，中日之間「共同抗蘇」的戰略需求已經消失，雙方之間的關係必然也會發生變化。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也逐漸意識到建立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對經濟發展是重要的，特別是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更不能忽視，可從近年來中國加強與東協、中亞等國家的交往便可理解，而中國的這些作為所呈現的面貌，便是所謂的「和平崛起」、大國外交等概念，這在日本或是美國看來自然具有相當的威脅性，於是也曾有過「中國威脅論」的出現。中國當然知道與日本維持友好的關係很重要，但由於兩國之間的歷史、領土、能源、安全等諸多問題，加上日本在冷戰後加強其「正常國家」目標的作為，包括試圖修改和平憲法第九條、推動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首相參拜具爭議性的靖國神社等等，都讓中國憂心忡忡，也讓兩國的關係在冷戰後呈現矛盾不已的樣態。

## 二、研究目的

本文試圖從兩個觀點出發來探討冷戰後的中日關係，分別是中國的崛起以及日本的國家正常化。雙方各自的國家發展目標將會對兩邊的關係造成何種影響，或將導致整個區域的不穩定，或是會基於共同利益來擱置爭議以求發展。

本文的研究目的在於探討以下問題：

(一) 中國崛起的意義為何？崛起的中國在政治、經濟及軍事等方面都有長足

<sup>16</sup> 錢其琛，「變幻的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外交」，求是（北京），第 24 期（1990），頁 8-11。

的進步，這將為冷戰後的中日關係帶來了何種影響，而日本對中國的認知，是否在中國崛起之後有所轉變，也是探討的重點。

(二) 日本正常國家的訴求及操作為何？由與政經力量之間的大幅落差，日本出現所謂邁向「正常國家」的呼聲，而向「正常國家」的推進又將可能為中日關係帶來如何的變化，中國對日本的作為又會有哪些反應，亦是本論文重要的研究目的。

(三) 在中國崛起以及日本正常國家的交織之下，中日關係將呈現何種面貌，是走向對立或是會出現緩和的空間。美國處在其中又將扮演何種角色，未來的中日關係又可能走向何處？除了雙邊的關係之外，東北亞的情勢是否也將可能受到影響。

##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在文獻回顧這個部分，就筆者目前所蒐集到的資料來看，若將其簡單的分類，可以分為幾點來探討。首先是從國際體系的角度來檢視，由於冷戰的終結，使得冷戰前和冷戰後的國際體系有著很大的變化，這個部分主要是探討體系的變遷對中日關係甚至東北區域的影響；其次是從同盟關係和安全困境的視角出發，試圖從美日同盟與中國之間的互動，來觀察彼此的關係，有相當數量的文獻認為兩者之間有著安全困境的特徵；最後是以中國崛起的面向來觀察，究竟中國的崛起對於日本、美國甚至其他國家，是否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又或者是有著不同的意義產生。

### 一、國際體系的角度

將國際體系（international system）運用來觀察國與國之間雙邊或多邊的關係，對於許多國際關係學者來說是相當常見的，尤其是現實主義學者。對國家而言，體系意指在一個大架構之下，成員彼此接觸、影響，進而形成包括合作、衝突、貿易、溝通等關係在內的互動關係，國家在體系之中使用權力，也汲汲於追求權力，體系不僅是一個範圍，也是觀察的對象與國家活動的空間。<sup>17</sup>

從宏觀的全球體系而言，若以國家中心（state-centric）的角度來觀察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前的這段時期，國際體系可說毫無疑問的就是美蘇的兩極體系，可以發現其無論是對集團內部或外部（不結盟國家）的成員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有極其明顯的影響力和牽制力。這當然也對當時的中國和日本造成很大的影響，例如中國的「一邊倒向蘇聯」的政策，<sup>18</sup>和日本的「追隨外交」，<sup>19</sup>主要都是受到當時

<sup>17</sup>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第三版（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頁 133。

<sup>18</sup> 可參見曲星，**中國外交 50 年**，頁 9-57。

<sup>19</sup> 學者稱「追隨外交」、或「外交政策傾向英美」，主要是在說明日本的對中國政策在考量日美的同盟關係和避免損及日美情誼的前提下，採取「追隨二元體系中民主集團領導國美國」的政策。林金莖，**戰後中日關係與國際法**（台北：中日關係研究會，1987年），頁 35-36；章前明，「吉田茂的外交觀」，**日本問題研究**（河北），1996年第3期（1996年9月），頁 39-43。

國際體系的影響。

美蘇兩極對峙體系自 1991 年隨蘇聯的解體而遭瓦解，原本的兩極體系也變成單極，國際體系面臨了劇烈的變化。<sup>20</sup>在歐洲，區域體系在東歐民主化、兩德和平統一、與蘇聯瓦解的情況下產生巨變，對歐洲國家的國際關係影響至大，<sup>21</sup>但由於有多邊安全合作保障的北約，以及經濟逐漸融合的歐洲聯盟，區域內整合的速度與廣度都有所加深。在東亞，區域體系受到冷戰終結的影響也呈現出不同的面貌，美日原先共同的軍事目標蘇聯消失了，加上美國在冷戰後國內經濟衰退而逐漸將其軍事勢力自東亞退出，在此情況下，美國一方面要日本多負擔駐軍防衛開銷，另一方面也將美日安保條約防衛範圍擴大，就是希望日本能為亞太地區的安全多負一點責任，<sup>22</sup>同時也將防衛目標轉向興起中的區域霸權中國，以確保美日安全與經濟互動的延續。Francis Fukuyama 認為安全利益仍然是美國關切的焦點，但是日本則需擔負更多的軍事責任，<sup>23</sup>在此種共識下使雙方在安全和經濟議題上達成共同的準則。而美日之間定期舉行軍事演習，對兩國共識的形成及減少認知上的誤判亦具有某種程度的效果。<sup>24</sup>

冷戰後初期，美日關係由於受到美日貿易衝突及美國政府受到「日本威脅論」的影響，雙邊關係並不算友好，連帶使日美關係呈現搖晃的現象，甚至出現所謂同盟漂流的危機。而由於美國政策的擺盪，使東亞地區內的三個主要國家間的三個雙邊關係，連帶呈現不穩定的情形，雖然存在如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的多邊安全合作機制，但其功能仍舊不能令該地區國家滿

---

<sup>20</sup> 關於 1990 年前後，對冷戰後時期國際體系各種預測之整理，可參見明居正，**國際政治體系之變遷**（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2）。

<sup>21</sup> 柯玉枝，「從國際體系變遷看後冷戰時期中共與日本之外交關係」，**中國大陸研究**，第 41 卷第 6 期（1998 年 6 月），頁 25。

<sup>22</sup> 蔡增家，「美日安保條約的政經意涵與制度的調適」，**問題與研究**，第 37 卷第 9 期（1998 年 9 月），頁 16。

<sup>23</sup> Francis Fukuyama and Kongdan Oh, *The US-Japan Security Relationship After the Cold War* ( Santa Monica, CA: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 Press, 1993 ), pp. 49-50.

<sup>24</sup> S. Javed Maswood, *Japanese Defence: The Search for Political Power* (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90 ), pp. 67-71.

意。<sup>25</sup>一直要到美國在東亞政策上的日趨明確，就是美國在 1995 年提出其「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報告（簡稱「東亞戰略報告」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 EASR）之後，<sup>26</sup>選擇日本為戰略盟邦，這個體系不穩定的情況才有所緩和，<sup>27</sup>而 1996 年 4 月美日新安保宣言的提出，也標誌著美日關係的重塑完成。因此美日同盟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成爲了東亞這個區域體系相當受矚目的焦點。

## 二、同盟關係與安全困境的角度

關於同盟關係，George Liska 表示，在分析或討論國際關係時，幾乎不可能會不注意到同盟關係，一般來說，同盟關係多半是有針對性的，也會因某些國家或是某些事情而形成。<sup>28</sup>國家間互動關係的友好或敵對氣氛，將會影響國家對於國際互動關係究竟應該採取合作或是對抗的態度，進而可能促使國家產生抗衡（balancing）或扈從（bandwagoning，即支持佔有優勢的一方）的政策思考，並進而採行同盟或反同盟（counter-alliance）的作法。<sup>29</sup>Glenn Snyder 亦指出，同盟的主要利益在於本國及盟邦遭受攻擊時可增強嚇阻力、藉同盟以增進本國防衛力量、阻止盟邦與敵對者形成結盟或合作關係、消除遭盟邦攻擊的可能性、增加對盟邦的控制及影響力。<sup>30</sup>因此，國家也會在「避免被拋棄」（avoiding abandonment）或「避免被捲入」（avoiding entrapment）此兩項困境中設法求取最適點（optimum

<sup>25</sup> 柯玉枝，「冷戰後『日中』外交關係之分析與展望」，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 年），頁 25-27。

<sup>26</sup> 1995 年 2 月的「奈伊報告」爲美國冷戰後的東亞政策定下基本方向，進而發揮穩定了日美關係的效果。Joseph Nye 在當時以國防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部長的身分提出「美國東亞太平洋地區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建議柯林頓政府應該修正老布希政府時代的美國東亞政策，因爲中國的成長驚人，尤其是國防預算上的急速膨脹，即使扣掉通貨膨脹率，五年內仍成長近 40%。參見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ited States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ebruary 1995)。

<sup>27</sup> 柯玉枝，「冷戰後『日中』外交關係之分析與展望」，頁 23-35。

<sup>28</sup>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lliance: 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 2-3.

<sup>29</sup> 關於抗衡或扈從，參見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吳玉山，*抗衡或扈從—兩岸關係新詮*（台北：正中書局，1997），頁 18-21。

<sup>30</sup>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43-46.

mix)，<sup>31</sup>而影響國家做出決策的決定性因素（determinants of choice）有三：利益（interests）、相對的依賴程度（relative dependence）、承諾的程度（degree of commitment）。

另外，日本學者福島啓之也從國家間的同盟關係、國際體系中同盟結構的觀點出發，結合權力平衡及霸權穩定論，提出了三國互動模型並進一步推衍出四國的互動模型，並以此說明 20 世紀使東亞地區戰略關係發生重大改變的兩個戰爭（日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前的同盟外交及當時東亞國際體系的不安定，來展望美日同盟與中國三者間的關係，分析出美日同盟間的關係是一種非均衡關係，而此種同盟型態與第三國（中國）間呈現的是一種不安定的狀態。<sup>32</sup>中國學者金熙德亦將美日同盟的非均衡關係定位為「美主日從」的互動框架。<sup>33</sup>而根據 Zbigniew Brzezinski 對日本的戰略評估，也認為日本不過是美國力量在亞太地區地緣政治中的延伸，不屬於「地緣戰略棋手」（geostrategic player），日本在亞太地緣政治格局重塑過程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是下降的。<sup>34</sup>他也提到日本不可能成為起主導作用的亞洲地區大國。<sup>35</sup>綜合以上說法，似乎可以發現日本在亞太地區的處境是相當尷尬的，如同 Robert Ross 所言，地理因素對日本造成了相當大的障礙，狹小的國土制約了日本發展自主經濟的能力以及在航空和導彈時代開展軍事競賽的能力，<sup>36</sup>這導致日本無法成為亞太地緣政治競爭中完整的一極，而僅能成為與頭等大國（美國）合作來尋求安全的次等大國。

對中國來說，在冷戰後時期中，美日同盟一直是一個難解的問題，中國既不願意見到此一聯盟太緊密、太堅固，也不願意見到它太鬆散、太脆弱。假使這個

---

<sup>31</sup>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pp. 108-191.

<sup>32</sup> 福島啓之，「同盟構造と国際システムの安定」，*國際政治*，第 117 号（1998 年 3 月），頁 173。

<sup>33</sup> 金熙德，*日美基軸與經濟外交：日本外交的轉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 149-162。

<sup>34</sup>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p. 45.

<sup>35</sup> Zbigniew Brzezinski, *The Grand Chessboard: 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 p.208.

<sup>36</sup> Robert S. Ross, "The Geography of Peace: East Asi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90-92.

聯盟太緊密，意味著中國在面對美日聯手的情形下將處於劣勢；但若是這個聯盟太鬆散，則代表這可能會導致日本在東亞地區採取更強勢的作為。中國認為美日間的安全關係對於抑制日本的軍事力量及維持區域穩定非常重要，但其反對美日防衛合作指南之修訂其所持理由是美日可能因而在台海危機中合作，且日本軍國主義可能因而再起。<sup>37</sup>因此，中日兩國之間的互動關係，美國的任何舉動絕對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關鍵點。

中日在安全領域的日趨緊張形勢所呈現的是，雙方逐漸陷入西方國際關係學者所言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之中，也就是雙方都把對方增強安全利益的任何行為視為自身安全利益的損失，雙方為確保自身安全利益而不斷增強實力，這也導致中日兩國逐漸陷入安全競爭結構中；<sup>38</sup>除此之外，包括中美兩國的許多研究者在內，都對亞太國際秩序出現的安全困境情形，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在評估之後一般都抱持著不樂觀的態度。<sup>39</sup>造成亞太國家陷入了相互惡化的安全困境環境，主要是因為地緣政治、權力平衡和心理因素。<sup>40</sup>其過程是沿著「領土爭議」→「軍事手段」→「軍備競賽」→「安全困境」這條道路進行。<sup>41</sup>

對新現實主義學者來說，安全困境基本上是一種國際關係常態，存在於各類

<sup>37</sup> 金泰和，「在美國與中共之間求取平衡：南韓的新安全挑戰」，美國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編，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中共崛起構成的挑戰：亞洲觀點*（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頁 73-103。

<sup>38</sup> 關於安全困境的概念，可參見 Nicholas Wheeler & Ken Booth,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John Baylas & N. J. Rengger, ed., *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p. 29;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1978), pp. 169-170.

<sup>39</sup> Aaron L. Friedberg, "Ripe or Rivalr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1994), pp. 5-33; Richard K.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3/94), pp. 34-77; and James Goldgeier & Michael McFaul, "A Tale for Two Worl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 2 (Spring 1992), pp. 467-492; 閻學通，*中國與亞太安全：冷戰後亞太國家的安全戰略走向*（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陳峰君、王傳劍，*亞太大國與朝鮮半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亞太戰略場：世界主要力量的發展與角逐*（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

<sup>40</sup> 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a,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4 (Spring 1999), pp. 49-80; 時殷弘，「東亞的安全兩難與出路」，*大公報*（香港），2000年7月12日。

<sup>41</sup> Gerald Segal, "Networked Security: Why We Do Not Need A New Framework for East Asian Security,"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12, no. 2 (Summer/Fall 1998), pp. 488-505.

型國家之間，因而中國與日本的安全關係呈現安全困境特質是必然的。<sup>42</sup>Robert Jervis 指出，一國基於尋求增加自身安全的所作所為，往往具有不經意損害他國的安全的後果，從而也將迫使他國採取相同的行為。<sup>43</sup>Barry Buzan 也提到，當國家為自己尋求安全與權力的時候，很容易同時威脅到其他國家對安全和權力的追求，安全困境因此產生。<sup>44</sup>Richard Smoke 則指出，安全困境無法避免是因為國家通常難以在安全上以不作為的方式來應對可能產生的威脅。<sup>45</sup>Nicholas Wheeler 和 Ken Booth 也曾經提出，安全困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對於對方的意圖有著難以解決的不確定性 (unresolvable uncertainty)，<sup>46</sup>例如像是無法判定對方軍備行為究竟是為了防禦，亦或是有著進攻目的。

進入新世紀之後，中日兩國關係不僅是「政冷經熱」，雙方在安全領域的關係更朝緊張且惡化的方向發展。自 2004 年起，雙方在涉及安全領域上的紛爭頻仍，包括中國民間人士強行登陸釣魚台、在東海開採油氣田、海洋調查船頻繁的在日本海域探測。11 月，中國漢級核子動力潛艦更被發現潛入日本宮古島附近海域。<sup>47</sup>12 月 10 日日本內閣安全保障會議通過了有關今後十年防衛力量配備的「新防衛計畫大綱」和「中期防衛力整備計畫」，其中指出「中國對本地區的安全有重大影響，正在推進其核技術和導彈能力以及推進海軍及空軍現代化進程，也正在擴大海上活動，所以有必要關注這些發展」，<sup>48</sup>這是自 1975 年日本制訂防衛計畫大綱以來，首次出現這樣的內容。由這些例子可以大致看出雙方在安全上互不信任和相互恐懼下的表現。會造成這些不安全感，相互猜疑，甚至是執著於

---

<sup>42</sup> 張雅君，「中日關係的安全困境：國際體系與雙邊利益層面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6 卷第 4 期（2005 年 10 月），頁 142。

<sup>43</sup> Robert Jervis, "Realism, Game Theory, and Cooperation,"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3 (1988), p. 317.

<sup>44</sup>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lo.: L. Rienner, 1991), p. 295.

<sup>45</sup> Richard Smoke, "A Theory of Mutual Security," in Richard Smoke & Andrei Kortunov, ed., *Mutual Security: A New Approach for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1), p. 76.

<sup>46</sup> Nicholas Wheeler & Ken Booth, "The Security Dilemma," p. 30.

<sup>47</sup> 張雅君，「中日關係的安全困境：國際體系與雙邊利益層面的分析」，頁 140。

<sup>48</sup> 日本防衛省，平成 17 年度以降に係る防衛計画の大綱，〈<http://www.mod.go.jp/j/defense/policy/17taikou/taikou.htm>〉。

軍事安全和權力，根據新現實主義的說法，原因就在於國際體系經常處於緊張狀態，<sup>49</sup>而造成國際體系的緊張狀態又源於這種不信任感，此種類似何者為因，何者為果的難解問題，也正是中日關係之所以複雜的原因之一。

### 三、中國崛起的角度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黨校前常務副校長、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曾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針對「中國的和平崛起」進行專題演講；<sup>50</sup>同年12月10日，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哈佛大學的演講，亦對「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做出綱要性的闡述，明確表達了中國「和平崛起」的觀點。<sup>51</sup>自此之後，中國的「和平崛起」論，即被定位為新的國家發展戰略，而深受各國與各界的矚目與討論。檢視中國提出的「和平崛起」論點，可發現其中的目的，除了要消弭「中國威脅論」的聲浪，還希望能夠發揮自我角色定位的效果，並展現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對國際社會的承諾與自我期許。

各界對於中國崛起的討論隨著其政權的興衰而有所起伏。早在1959年中國研究的先驅Doak Barnett就曾以「中共之經濟戰略：崛起的中國大陸」(*Communist Economic Strategy: The Rise of Mainland China*)為題，來研究中國的經濟問題。<sup>52</sup>另外，Robert Goldston亦在1967年出版「紅色中國之崛起」(*The Rise of Red China*)一書闡述了中共建政之過程。<sup>53</sup>到了鄧小平在1978年開啓的改革開放後，更使中國步入了經濟改革的軌道，綜合國力也逐漸上漲，因此有關中國崛起的議題，則更讓世界各國注意，不敢掉以輕心。Ross Munro首先於1992年在「政策研究」(*Policy Review*)季刊上，以「覺醒之龍：中國對亞洲的威脅」(*Awakening Dragon:*

<sup>49</sup>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p. 21.

<sup>50</sup> 鄭必堅，「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2003年博鰲亞洲論壇演講」，中國網（北京），2003年11月3日，〈<http://www.china.org.cn/chinese/OP-c/448115.htm>〉。

<sup>51</sup> 溫家寶，「把目光投向中國—哈佛大學演講」，人民網（北京），2003年12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GB/shehui/1061/2241298.html>〉。

<sup>52</sup> 參見Doak A. Barnett, *Communist Economic Strategy: The Rise of Mainland China* (Washington: 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 1959).

<sup>53</sup> 參見Robert Goldston, *The Rise of Red China* (Greenwich, Conn: Fawcett, 1967).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為題，開啓了一波有關中國崛起大辯論的序幕，他提到中國不僅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在軍事領域也漸露頭腳，雖然難以斷定中國是否會取代蘇聯成為美國的新敵人，但毫無疑問的是，不管是在經濟或安全利益上，中國都將逐漸成為美國的一個威脅。<sup>54</sup>另外，學者如 John Mearsheimer 也強調，中國將於 21 世紀初成為對美國最危險的潛在威脅；<sup>55</sup>而 Joseph Nye 也將中國列為頭號的潛在挑戰者，<sup>56</sup>排名在日、俄、印、歐之上。

1993 年 Nicholas Kristof 也曾以「中國崛起」(The Rise of China) 為題，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季刊上提醒世人密切關注中國經濟的持續成長，因為此一現象極可能對全球政治、經濟及軍事產生重大的影響。按照他的說法，他認為中國在 21 世紀上半期的經濟會超越美國而成為世界第一，但相對的，中國的高速經濟成長也將會對世界帶來一波衝擊，例如將使全球性原料特別像是石油供應的短缺，以及為求發展而造成生態環境的破壞。另外，他以購買力平價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來計算中國的國防支出，得出高達 900 億美元的數字。<sup>57</sup>此外，關於中國的經濟實力，Ronald Tammen 也根據購買力平價的方式預測，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將於 2015 年左右一舉超越美國。<sup>58</sup>在 2003 年 10 月，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亦曾預測中國的 GDP 將於 2041 年超越美國，但與 Tammen 不同的則是高盛公司並非運用購買力平價，而是以匯率為準的方式來進行估算。<sup>59</sup>2005 年初，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

---

<sup>54</sup> Ross H. Munro, "Awakening Dragon: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 *Policy Review*, No. 62 (1992), pp. 10-16.

<sup>55</sup>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362.

<sup>56</sup> Joseph S.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7-35.

<sup>57</sup> Nicholas D. Kristof, "The Ris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ol. 72, no. 5 (Nov/Dec 1993), pp. 59-74.

<sup>58</sup> Tammen 除了比較各家的不同之處外，還引述了藍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在 1995 年做的研究，該研究顯示出中國的 GDP 將可能於 2015 年時，比美國的數值高出大約 27%。詳見 Ronald L. Tammen, et al., *Power Transitions*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pp. 154-155, 210.

<sup>59</sup> Dominic Wilson & Roopa Purushothaman, *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 99: Dreaming with the BRICs: the Path to 2050* (New York: Goldman Sachs, 2003), p. 3. <<http://www2.goldmansachs.com/insight/research/reports/99.pdf>>。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所作的報告指出，21 世紀可能是亞洲—中國與印度—的世紀，<sup>60</sup>這就如同 20 世紀是美國的世紀一樣。

以下則針對各學者對於中國崛起的著作，簡單分成正面及反面兩個面向。對中國崛起存有較正面觀感者，例如 Evan Medeiros 和 Taylor Fravel 就認為中國的崛起是帶有多元利益的，且是可以負起責任的大國，在心態上也逐漸擺脫過去毛、鄧時期國家是受害者 (victim) 角色，而中國「多極化」的外交思想也反映出在外交政策上的彈性作為，從其積極加入多邊的國際組織都可看出端倪。<sup>61</sup>另外持較正面看法者，還包括了 Erza Vogel 所編的「與中國共處：21 世紀的美中關係」(*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sup>62</sup>以及大前研一的「中國，出租中」，「中華聯邦」等書。<sup>63</sup>

對於中國崛起持較反面看法的學者，像是一些現實主義論者，如 Brzezinski 和 Mearsheimer，他們從結構面來觀察，就悲觀的認為中美衝突乃遲早之事，中國經濟強大之後，一定會步上強權後塵，積極發展軍備，以維護、拓展其經濟利益，因此，中國崛起勢必改變既有的權力結構，造成不平衡。<sup>64</sup>而 Alastair Iain Johnston 在研究明朝處理蒙古的問題中，得出中國在處理對外危機時，並非採行儒家王道或孫子不戰屈人之兵的思想，從古至今，中國傾向透過武力解決外在危機。<sup>65</sup>Gerald Segal 則又以另一種獨特的角度來分析中國崛起，他認為學界對於崛起的中國看得太重，中國不管在經濟、軍事、政治上，並沒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sup>60</sup>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Mapping the Global Future*, 2004, <<http://www.foia.cia.gov/2020/2020.pdf>>.

<sup>61</sup> Evan Medeiros & M. Taylor Fravel, "China's New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6 (Nov/Dec 2003), pp. 22-35.

<sup>62</sup> Erza F. Vogel, *Living with China: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W.W. Norton, 1997).

<sup>63</sup> 大前研一著，許曉平譯，**中國，出租中**（台北：天下雜誌，2002）；大前研一著，趙佳誼、劉錦秀、黃碧君譯，**中華聯邦**（台北：商周出版社，2003）。

<sup>64</sup> Zbigniew Brzezinski & John J. Mearsheimer, "Clash of the Titans," *Foreign Policy*, no. 146 (Jan/Feb 2005), pp. 46-50; Bill Gertz, *The China Threat: How the People's Republic Targets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0).

<sup>65</sup> 高朗，「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7 卷第 2 期（2006 年 4 月），頁 66；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pter 5.

<sup>66</sup>另外，如 Richard Bernstein 和 Ross Munro 合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以及章家敦 (Gordon G. Chang) 所著的「中國即將崩潰」(*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就分別以不同角度來評論中國崛起，但主要是採取較反面態度。<sup>67</sup>

---

<sup>66</sup> 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Oct 1999), pp. 24-36.

<sup>67</sup> Richard Bernstein & Ross Munro,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 1997); 章家敦著，侯思嘉、閻紀宇譯，**中國即將崩潰** (台北：雅言文化出版，2002)。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途徑及名詞界定

#### 一、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要是指蒐集與處理資料的方法而言。<sup>68</sup>本論文主要將採取文獻分析法，試圖利用相關文獻例如相關國家（相關國家除直接相關之中、日兩國外，還包括有美國）之間簽訂的條約、協定及公報等等，也包括國家領袖及相關決策者等重要人士的發言、聲明，相關國家重要的政策宣示，如國防白皮書、新聞稿等一手資料，再加上重要媒體的相關報導以及智庫或學者所發表的評論、報告或學術性文章。本論文將以上述這些文獻資料為基礎來分析所要探討的問題，期望在對這些問題有充分瞭解之餘，也能夠得到個人的另一番看法。

除了文獻分析法之外，將在輔以歷史研究法來補其不足。由於歷史上發生的各事件幾乎都有跡可尋，因此對歷史事件的瞭解將有助於歸納出事件的前因後果，進而能夠對該事件有更充分的理解與掌握，雖然歷史可能不具有預測的功能，但若對歷史不熟悉，也將無法進窺事件之全貌。本文所要研究的冷戰後的中日關係，其必然也脫離不了冷戰時期甚至更早以前雙方的種種作為，例如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自從二戰結束後到現在，一直還是讓無法讓兩國擺脫這段歷史，甚至仍身陷其中。因此我們知道歷史的重要，所以對歷史的瞭解便不能忽視。

#### 二、研究途徑

研究途徑是指對於研究對象的研究是從哪一層次為出發點、著眼點、入手處等，去進行觀察、歸納、分類與分析，而由於著眼點的不同（即研究途徑不同），就會有不同的概念來作為分析的架構。<sup>69</sup>本文將利用結構現實主義中分析層次的概念（level of analysis）來作為主要研究途徑。關於分析層次的探討，主要起源

<sup>68</sup> 朱宏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頁 186。

<sup>69</sup> 同上註，頁 182。

於 Kenneth Waltz 在 1959 年的著作「人、國家與戰爭」(Man, the State, and War)，在該書中 Waltz 檢視歷來對戰爭起源的各種分析，並將其研究之所得整理為三個「觀察層面」(image) 的論證，包括：1、個人層次。例如對決策者的人格特質，像是好勇鬥狠等，來推演戰爭發生的原因；2、國家層次。對國內政局或決策程序，是否民主等因素來預估戰爭的可能性；3、國際層次。例如國際結構是單極、兩極或是多極等的權力分配狀態，來探討戰爭的可能性。<sup>70</sup>

Waltz 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之下，主要研究的大多以戰爭為主，而本文將要以分析層次這個概念為基礎，來探討冷戰後的中日關係。例如雙邊是否受到決策者或相關重要人士的主導，或是受到兩方各自國內政局的影響，又國際結構是不是亦會對雙方關係發生作用，例如東北亞的情勢、美國的因素等。

另外，本文在利用此三個分析面向之餘，將特別強調第三個層次，也就是國際層次的作用，原因在於國際層次將可與國際體系相結合，而能藉此將體系分析 (system analysis)<sup>71</sup> 的概念帶入中日關係的研究中。James Rosenau 在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一書中曾對全球體系和區域體系的變化與互動對世界政治格局的影響做一探討，他認為隨著全球體系影響的減弱，區域體系的活動空間將因而增加，而此現象也將成為世界變動的根源。<sup>72</sup> 本文也將採取 Rosenau 這個概念作為另一研究途徑，用來分析冷戰後中日關係受到體系變遷影響的情況。

---

<sup>70</sup>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轉引自耿曙，「分析層次與國際關係」，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台北：揚智文化，2003），頁 40-55。

<sup>71</sup> 體系分析是一種涉及資源分配的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 概念，雖常與體系理論互用，但並無理想的理論目標 (ideal theoretical goals)，但相反的體系理論卻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假設、原則，在理論上更是可在人類知識中普遍適用。關於體系分析可參閱 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haltzgraft 著，閻學通、陳寒溪等譯，**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第五版（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頁 111-150。

<sup>72</sup> James N. Rosenau, *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 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2-13. Rosenau 除了提出體系變動的因素外，還提出另外四項變動世界的根源 (sources of change)，分別是：1、油工業化社會邁向後工業化社會的秩序；2、空氣污染、恐怖主義、毒品貿易、匯率危機及愛滋病等這些非屬傳統政治所關切之議題的出現；3、國家或政府在獨自圓滿處理各項政治議題的能力下降；4、解決各項新舊問題的專業技術人員或團體將對世界造成回饋式影響。我們可以發現這四項因素在目前的國際社會上，受到注目的程度已經比之前提升許多。

### 三、名詞界定

#### (一) 中國崛起

關於中國的崛起，其名稱不論是「和平崛起」或是「和平發展」，其內涵和意義幾乎是相同的，而本論文所謂的中國崛起，主要即是要利用這個概念來作為分析的基礎，但是這邊仍將對這些名稱的變化作一個說明。

「和平崛起」這個名詞首次出現在博鰲亞洲論壇 2003 年的年會上，是由中國中央黨校前副校長鄭必堅所提出。而當時提出這個概念的背景，是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實力提升之後，所可能帶來的影響有所疑慮，而出現了「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等說法。因此在 2003 年胡錦濤為消弭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不放心，而令鄭必堅等人帶領理論專家，全力建構「和平崛起」的中國理論。

但到了 2004 年，中國內部逐漸有不同的聲音出現，認為「和平崛起」並未如預期的消除「中國威脅論」的聲音，反而可能會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崛起產生更多的疑慮，而期望改以「和平發展」代替，用以論述中國的發展前景與道路。在 2004 年 3 月共中央政治局即對「和平崛起」一詞做了三個決定：1、不再凸顯「和平崛起」；2、不要否認「和平崛起」；3、官方可以淡化，民間可以繼續討論。<sup>73</sup>因此 2004 年 3 月 14 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第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閉幕記者會上，所提到的「和平崛起」，也是中國官方最後一次公開使用這個字眼。下表（1-1）則為中國高層對「和平崛起」的相關發言。

<sup>73</sup> 林中斌，「北京新大戰略下的對台政策(3)」，**軍事焦點評論**，2005 年 1 月 19 日，〈[http://www.diic.com.tw/comment/920213-222.files/940119\(3\).htm](http://www.diic.com.tw/comment/920213-222.files/940119(3).htm)〉。

表 1-1：中國高層對「和平崛起」相關發言

| 發言人與時間            | 演講題目                | 地點                   | 重要性                                      |
|-------------------|---------------------|----------------------|--|
| 鄭必堅<br>2003.11.3  | 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亞洲的未來     | 博鰲亞洲論壇               | 首次提出「和平崛起論」                              |
| 溫家寶<br>2003.12.10 | 把目光投向中國             | 美國哈佛大學               | 中國官方首次使用「和平崛起」一詞                         |
| 胡錦濤<br>2003.12.26 | 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週年座談會講話 | 北京，紀念毛澤東誕辰 110 週年座談會 | 中共總書記首次使用「和平崛起」一詞                        |
| 胡錦濤<br>2004.2.23  |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講話  | 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    | 中共總書記首次公開在中央高級幹部集體學習場合宣導「和平崛起」           |
| 溫家寶<br>2004.3.14  | 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       | 第十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閉幕記者會  | 中國官方最後一次公開使用「和平崛起」                       |
| 胡錦濤<br>2004.4.24  | 中國的發展 亞洲的機遇         | 博鰲亞洲論壇               | 雖然論壇以「中國和平崛起與經濟全球化」為主題，但胡錦濤的演講之中已不再提「崛起」 |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 （二）日本正常國家

關於日本「正常國家」（原文為普通の国）這個名詞，最初是出現在現任民主黨黨魁小澤一郎於 1993 所著的「日本改造計畫」一書中，小澤在該書認為日本既然已經是一個經濟大國，就應該成為「國際國家」，而其前提是要先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而其要件就是對於國際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就將他作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來進行，善盡自己的責任。<sup>74</sup>而小澤也認為日本在經濟援助方面已經做出了不少貢獻，只是在安全方面還不能盡如人意，他以波斯灣戰爭為例，認為日本在安全方面總以憲法和法律制度為藉口，對於不能提供軍事支援這點表

<sup>74</sup> 小澤一郎，日本改造計畫（東京：講談社，1993），頁 104。

示不滿。<sup>75</sup>

而在此前，也已經有類似於小澤提出的「正常國家」這個概念的出現，時間是在 80 年代。日本政府在 1980 年發表了「綜合安全保障戰略」，緊接著中曾根康弘在 1982 年上台之後，便提出「從經濟大國邁向政治大國的口號」，而在其任內的五年期間，日本的外交政策也由過去的「追隨外交」轉變為「自主外交」。<sup>76</sup>相較於中曾根的「政治大國」以及小澤的「正常國家」，可以發現其內涵以及意義是相當接近的。

關於名詞上的用法，本論文將採取小澤的「正常國家」。其日文原文是「普通の国」，中文翻譯有些譯為「正常國家」，有些譯為「普通國家」；而英文的翻譯則更顯雜亂不一，看過的文獻就有 normal state、normal nation、normal country、ordinary state、ordinary country 等多種譯名。為免困擾，本文將採取的名稱中文為「正常國家」，英文則為 normal state。另外，本文所提之「國家正常化」，是用來表示日本邁向「正常國家」目標的過程而言。

<sup>75</sup> 金熙德，「『普通國家化』：日本政治與外交行為方式演變趨勢的全面審視」，*東疆學刊*（吉林），第 23 卷第 1 期（2006 年 1 月），頁 55-56。

<sup>76</sup> 何思慎，*擺盪在兩岸之間：戰後日本對華政策（1945-1997）*，頁 107。

## 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總共包含六個部分。第一章為緒論，分為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論文架構，加上相關文獻回顧，最後則有本文所運用的研究方法、研究途徑和相關的名詞界定。

第二章則對本文主題之一的「中國崛起」做一番探討，重點則放在理論的源起和其內涵究竟為何。將闡述理論出現的背景及其提出的目的，整個崛起背後包含何種政治、經濟、軍事意涵在內；「中國崛起」在世界上究竟呈現出何種面貌，是否會對現階段的國際體系造成衝擊；而中國領導人又是如何看待國家的崛起及定位；另外，也將進一步探討日本對中國崛起有何認知。

第三章將探討本文對於影響冷戰後中日關係所提出的另一因素，也就是日本的「正常國家」。在這一部份主要將敘述日本採取此策略的動機為何，以及採行此策略的背景，而其「正常國家」的訴求到底為何；另外將分析日本究竟採取哪些作為來遂行其「正常國家」的目標；其國家領導人又是如何看待「正常國家」；最後亦將檢視中國對於日本的「正常國家」有何看法及認知。

第四章要探討的是本文的重點之一，也就是中日關係的現況及爭議。首先，必須瞭解中日關係與東北亞的政治結構呈現什麼樣貌，是否為美日同盟對抗中國，東北亞的政治結構又將受到何種程度的影響；其次，仍必須掌握中日之間難解的歷史問題，而上述的政治結構再加上中國的崛起以及日本的邁向正常國家這兩個元素，三樣東西加在一起是否會對原本的難題再蒙上一層陰影，或是會有另一番全新的圖象；第三，中日之間的領土以及能源問題，包括釣魚台爭議以及東海天然氣田的爭端，是否會因此而加劇或減緩；最後，將探討台灣問題在中日之間的扮演的角色。

第五章是本文另一個重點，這個部分將研析未來中日關係的可能發展以及挑戰。首先，美日同盟是否仍維持相同的形式，而繼續維持與中國對抗的態勢，或

者是會轉變或增加其功能，讓其有不同的功能存在；其次，探討多邊主義是否能夠在中日兩國之間形成，藉由多邊主義的力量，是否能夠解決中日之間的矛盾及困境；最後，將對中國近來提出的「和諧世界」概念，以及日本新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美麗國家」作一番探討，試圖去瞭解其將可能帶給中日關係何種影響。

第六章為結論。綜合上述所曾探討及分析的各問題作一總結，另外也將提出筆者對欲探討問題的研究發現及看法。

